

# 連結與跨越：台大女研社的成立、 運作與轉型

畢恆達（國立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

洪文龍（美國羅格斯大學婦女與性別研究學系）

陳志軒（國立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

---

台大女性研究社是臺灣第一個大學中的女性主義學生社團，對於形塑大學校園之女性與性別意識扮演重要之啟蒙角色。本研究主要訪談 16 位不同時期積極參與女研社的社員，並輔以正式出版品、媒體新聞，以及社團內部資料等既有文本，從女性主義的視角來建立與分析台大女研社在不同歷史階段的運作。台大女研社結合了理論與實踐，從工運、婦運與學院課程、讀書會中學習不同的能力並相互增益。她們在校園中組織女學生、與傳統學運社團對話，對外也串連她校女研社及婦運等運動團體。除了面對前述那些不同的對象之外，再加上後期出現的建制化性別組織，女研社就在這些群體構成的網絡中建構自己的運動路線，不只對抗了校園的父權結構，同時帶入從性別角度出發的學生視野，在引導眾多性別議題之際也培育了未來新一代婦運的新血。台灣性別運動近年來逐漸主流化與分眾化，台大女研社也順著這個軌跡發展，從體制外運動者的角色退下成為學術性社團。

**關鍵詞：**女研社、女性主義、婦女運動、學生運動、性別意識

---

收稿日期：2022 年 5 月 27 日；接受日期：2023 年 3 月 10 日。

**致謝詞：**本研究曾獲得科技部研究計畫補助（MOST 106-2410-H-002-215）。感謝所有受訪者無私的分享，給予初稿許多寶貴的回饋，以及《女學學誌》編輯部與審查人細心閱讀，多次給予具體而有建設性的修改建議。

## 一、前言

國立臺灣大學女性研究社（簡稱台大女研社<sup>1</sup>或女研社）是臺灣第一個大學校園中的女性主義學生社團（顧燕翎，2020），對於形塑大學校園之女性／性別意識扮演重要的啟蒙角色。研究女研社的歷史，可以「反省運動存在的時代條件……不同位置的婦女如何理解所謂性別壓迫」（王秀雲，2004：197）。然欲了解女研社的形成與發展歷程，卻找不到什麼文本。查詢台大女研社的網頁，也僅能從〈關於我們〉讀到「台大女性研究社創立於1988年，是解嚴後大專院校中最早成立的性別社團」這個簡單訊息（台大女研，無日期），不清楚成立的具體脈絡與過程。

台大女研社的成立受到學生運動與婦女運動共同的影響。從學運世代的文本來看，如鄧丕雲（1993）的《八〇年代台灣學生運動史》從學運的醞釀期談到野百合學運，雖然對於各校學運組織與活動有詳盡的描述和討論，但是並未涉及性別運動的面向，僅僅寥寥數語提及台大女研社曾經參與新埔的勞工運動。何榮幸（2014）的《學運世代》書中僅有七頁的「學運世代中的女性」一節，認為學運世代與其之前所有世代最大的差異就是女性的眾聲喧嘩。書中刊載了四位運動女性范雲、王時思、顧玉玲、孫瑞穗的故事，其中孫瑞穗是台大女研社的核心成員。

從婦運史的角度來看，顧燕翎（2020）的《台灣婦女運動》只有兩個段落提到女研社成立以及A片事件。王雅各（1999）的《臺灣婦女解放運動史》中第六章為〈校園中的純女生社團：女研社〉，討

---

1 本文統一使用「臺」字，但是若原作者使用「台」，則不加以修改。台大女研社的官方文件都使用「台」這個寫法。

論九〇年代的北部數個大學女研社，將之視為大致同質的團體進行分析。女性運動史學者王秀雲針對此書撰寫的書評指出：

作者關於女研社一章的描述更是完全沒有任何的資料（不論是訪談或文獻）作為根據，無怪乎沒有任何個別學校具體女研社的內容，僅僅談到女研社不收男社員及一些單薄的細節，全章幾乎都是作者想當然爾的想像，令人驚駭。（王秀雲，2004: 203）

描繪臺灣女性文化地標的《女人履痕 3》，其中有一篇由曾經擔任台大女研社副社長的伍維婷（2019）所撰寫的〈大學女研社與婦女運動之一九八八至二〇〇〇年〉，文中根據訪談與檔案資料重建成立台大女研社到全國大專女生行動聯盟（簡稱全女聯）的活動歷程，然而受到紙本書籍篇幅的限制，前後十餘年的種種事蹟只簡要帶過。此外，文中關於「性別與空間」讀書會、掙角度讀書會等描述細節，也有值得商榷之處。<sup>2</sup>綜觀上述已經出版的文獻，顯示我們對於台大女

- 2 舉例來說，（1）伍文寫道：「一九八六年，因為林夏如的邀請，曾昭媛與許郁蘭在考完大學聯考的暑假，到彰化鹿港進行『鹿港杜邦』事件的田野調查」（頁190）。然根據訪談，只有曾昭媛前往，且到了鹿港時，臺大的杜邦事件田野調查已經結束。（2）伍文寫道：「一九八七年的暑假，曾昭媛、許郁蘭、黃麗玲……柏蘭芝……與臺大城鄉所合作，首度舉辦『性別與空間』的讀書會，就讀城鄉所的張聖琳也加入其中」（頁190-191）。事實上，性別與空間讀書會乃是博士生張景森找了張聖琳一起組織，柏蘭芝、孫瑞穗等當時雖是大學生，但因修課或人脈因素經常出入都市計劃組（簡稱都計室），因而參與此讀書會。（3）伍文寫道：「臺大女研社在一九八八年正式成立，當時社團的指導老師是劉毓秀」（頁191）。然臺大課外活動組的檔案資料為簡瑛瑛。（4）伍文寫道：「『掙角度』〔原文如此〕讀書會……最早開始是，中央大學的丁乃非老師與從美國柏克萊大學回來的王蕓老師，兩人主動詢問台大女研社一起組織讀書會的意願」（頁191-192）。然根據訪談及《婦女新知》月刊的資料，掙角度讀書會

研社發展的理解仍然非常有限。

##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的目的是從女性主義的視角來建立與分析台大女研社的發展史，主要採用兩種方法蒐集資料。

(1) 訪談：女研社歷年來累計之社員眾多，找尋受訪者必須有所取捨。本研究最關心的議題之一是女研社成立的過程，因此盡可能訪談創社時期的重要成員（包括曾昭媛、許郁蘭、黃麗玲、張聖琳），以及前三任社長（柏蘭芝、孫瑞穗、古明君）。接下來是曾經參與重要事件的成員，包括參與 A 片事件的王慶寧與伍維婷，輔選王慶寧參與學生會會長選舉的杜歆穎，參與宿舍解除門禁的陳怡伶，生產眾多論述文本的張娟芬與李金梅，創社時期的男社員周克任，以及在二十一世紀加入的社員姚惠耀與葉峻成。總計訪談了 16 位在不同時期參與女研社的社員，這些訪談構成本研究的資料主體，以理解參與者的行動策略和心理歷程。除此之外，也訪談曾經擔任社團指導老師的劉毓秀與張小虹，搖角度讀書會成員鄭美里與成令方，參與解除宿舍門禁運動的學生王善卿，前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孫中興，前學生會性別工作坊成員張明旭，以及曾經採訪 A 片事件的新聞記者賀照緹。

女研社社員的訪談大綱包括成長過程中的性別經驗、性別意識從何而來，參與女研社的過程，女研社的活動與倡議，女研社與其他異

---

是由《婦女新知》月刊編輯鄭美里聯絡義工聚會開始，與丁乃非、王蘋、成令方、台大女研社部分成員及跨校女學生匯流，再轉型成搖角度。(5) 伍文第 192 頁將《婦女新知》月刊誤植為《婦女新知通訊》。

議社團／社會運動／婦女團體的關係等。如果訪談的資料，在分析過程中發現有所不足或有相互矛盾之處，我們再以利用網路或面訪的方式釐清問題。本研究的目的是在於建構台大女研社的發展歷程，而非探索某個社群共通的社會心理現象，必然涉及具體的人事物，因此在訪談之初就告知受訪者論文中將以本名<sup>3</sup>呈現。首先，文中如果提到某位受訪者就讀歷史系、曾經擔任社長，或者某受訪者的哥哥是民主學生聯盟（簡稱民學聯）的主導人物，或者某受訪者曾經競選學生會會長，即使以匿名呈現，其真實身分仍呼之欲出。再者，訪談資料會與既有的女研社成員發表的文本相互參照比對，匿名呈現也勢不可能。為了保護受訪者，我們在訪談前即承諾在投稿前會將初稿寄給受訪者核對。

（2）既有文本：除了台大女研社的內部資料（包括《新女聲》第1, 4-9, 11-13期、社辦留言本、海報文宣等）之外，本研究也使用「聯合知識庫」蒐集女研社相關新聞報導，檢視《婦女新知》月刊有關女研社的文章，搜尋網路影片（如A片事件新聞報導等），來與訪談文本相互參照。

表一：本文台大女研社成員受訪名單

姓名	就讀年度／科系	女研社職務	訪談日期與方式
張聖琳	1983／園藝系 1986／土木所	顧問	2018/01/02面訪

3 王秀雲（2004: 204）在評論王雅各（1999）《臺灣婦女解放運動史》一書時寫道：「該書中許多重要關鍵人物竟也以匿名的方式出現……形成了一個只有聲音沒有名字而魅影幢幢的歷史。」范雲（2004: 212）的評論則為：「這些英文字母不僅干擾閱讀，也因為其匿名性，對讀者而言，也失去了告知的意義。」

柏蘭芝	1985／歷史系 1989／城鄉所	社員、1988/09第一屆社長	2018/08/17面訪
李金梅	1985／中文系， 轉社會系 1989／社會所	社員	2022/06/10網路筆訪
陳怡伶	1985／農工系， 轉土木系 1989／城鄉所	社員	2019/11/04面訪
曾昭媛	1986／社會系	創社成員	2017/11/22同時面訪 曾昭媛、許郁蘭
許郁蘭	1986／數學系， 轉社會系	創社成員	2017/11/22同時面訪 曾昭媛、許郁蘭
黃麗玲	1986／國貿系， 轉哲學系 1991／城鄉所	創社成員	2017/10/26面訪
孫瑞穗	1986／政治系 1992／城鄉所	社員、1989/02社長	2018/01/15面訪
古明君	1986／資訊系	社員、1989/09社長	2019/04/13面訪
周克任	1988／大氣系	社員（男）	2018/10/11網路筆訪
張娟芬	1988／社會系	社員	2017/11/21面訪
杜歆穎	1991／法律系 1995／城鄉所	社員、1993/09社長	2018/02/25面訪
王慶寧	1992／心理系	社員、1995/02社長、1995/09學生會會長	2017/12/08電話訪談
伍維婷	1993／政治系	社員、1995/02副社長	2018/07/02面訪
姚惠耀	2013／歷史系	社員（男）、2014社長	2018/08/02面訪
葉峻成	2017／電機系， 輔修人類系	社員（男）、2018副社長	2022/04/27面訪

由於受訪者與我們都是舊識，取得信任關係不算困難。訪談最大的挑戰是，女研社成立距今已三十多年，受訪者很多記憶已經模糊（例如當年究竟在哪間宿舍播放 A 片？放映幾場？），需要藉由相關文本（如當年出版的文章與照片）來提出發問。不同受訪者的說法，也會在訪談時提出，交叉檢證。因此歷史的建構就有賴於盡量搜集相關的既有文本，取得受訪者信任以進行深入訪談，並且在訪談資料與既有文本之間來回比對。理論上，當年即時出版的文本應該比多年後的回憶更加可靠，但是公開的文本不一定反映事實，仍有賴幕後的訪談加以揭密。

此外，為了提高論文可信度，在論文初稿完成之後，我們將初稿寄給所有女研社受訪者，請他們核對是否有錯誤或不當之處。部分受訪者除了指正錯誤，更進一步補充資料，並且提出具體的分析建議。

### 三、女研社發展歷程

臺灣社會性別的啟蒙深受民主運動的影響，然而要談民主意識啟蒙，有必要先從戒嚴、白色恐怖時期說起。

國民黨政權基於在中國失敗的教訓，遷臺之後嚴格控制校園，避免學運再次危及統治地位。校園控制包括三個層面：（1）正式法規：以特別權力關係來定義校園，學生不得在校外政治選舉中助選，嚴格限制校園內的集會結社、言論出版，並輔以一套懲戒制度。（2）黨團情治系統：國民黨透過各個青工會、知青黨部，到各班級學生小組，形成一套從中央貫穿到學生的控制系統。救國團則經由各校課外活動組，將社團納入管制。各校內的國民黨化名社團，則滲透到社團與班級，對學生進行監控與分化。（3）文化意識形態：強調中國民族主



義、販賣廉價人道關懷、鼓吹逸樂文化。救國團也藉由各種育樂活動，疏導青年旺盛的精力。這些控制造成大學校園學生對於公共事務的冷漠（鄧丕雲，1993）。行政院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於2021年公布「校園安定系統」的佈建情形（陳鈺馥，2021），證實國民黨政權為防範學潮，透過情治系統在校園內佈建「線民」以掌握地下社團、偏激社團與刊物的動態。

在這樣的層層監控之下，被壓迫者的反抗也相應而生。若將焦點放到彼時的臺大校園，首先是在海外保釣運動的帶動下，臺大學生也掀起保釣熱潮，將校園公共論述主題從文藝浪漫轉向國家政經大事（鄭鴻生，2001），掀起了一連串的學生民主抗爭，訴求爭取言論自由、全面改選中央民代等（洪三雄，1993）。不過這些抗爭也引來國民黨政府對左翼學生的鎮壓，1973年警總動手抓人，再到1974年的「臺大哲學系事件」，讓這波校園抗爭戛然而止（鄭鴻生，2001）。

七〇年代黨外運動興起，隨著幾次選舉，臺灣的政治與社會起了劇烈的變化，鄉土文學論戰啟發了大學生的本土關懷與意識。1979年美麗島事件之後，黨外抗爭轉向議會與出版。大學生藉由閱讀禁書（左派書籍、黨外雜誌等）打破國民黨的神話，從被欺騙走向反抗。大學生藉由參與黨外助選，感受社會脈動，鍛鍊分析與抗爭的能力（鄧丕雲，1993）。

由劉一德、賴勁麟、李文忠、王增齊、楊金嚴於1981年所組成的臺大「五人小組」是八〇年代學生運動的先鋒。他們採用海報游擊戰、「早安寫黑板」、出版手寫油印地下刊物，來控訴國民黨的不義、喚醒校園內冷漠的學生群眾（鄧丕雲，1993）。更為蓬勃的校園運動則以1982年的「臺大普選事件」為濫觴。1986年的「李文忠事件」促使大學校園內公開的集體抗爭行動。至於臺大學生的杜邦事件調查



團則代表大學生以公正第三者的身分，走出校園，參與社會的改革行動。緊接著大學新聞社因報導李文忠事件，以及參與杜邦事件調查，遭校方停社一年，社員也遭記過處分。大新事件成為 1986-1987 年間「自由之愛」的導火線，讓臺大學運走入直接訴求群眾支持的型態，並將訴求提高到大學改革的層次（林仁傑，2004）。此後，1987 年解嚴、社團成立解禁，議題性社團紛紛成立，臺大代聯會也改組為學生會，會長由普選產生。這些學運行動構成了接下來校園內女學生集結行動的重要養分。

大學校園的女性集結，也受到婦女運動的影響與啟發。1971 年呂秀蓮留美返臺之後大力推行新女性主義，咸認是戰後臺灣第一波的婦女運動（范雲，2003）。她創辦「拓荒者出版社」，出版《新女性主義》，主張「先做人，再做女人」、「女人走出廚房」與「人盡其才」。呂秀蓮因美麗島事件入獄後，李元貞等人援引黨外雜誌模式，創立「婦女新知雜誌社」（簡稱婦女新知），透過出版及活動宣傳女性主義理念。婦女新知投身於反選美、救援雛妓、支援女工等運動，推動《優生保健法》、《男女工作平等法》等法案，並於解嚴後改組為「婦女新知基金會」（李元貞，2014）。在此同時，主婦聯盟、晚晴協會等團體也相繼成立，關注不同的女性議題，藉由服務工作、推動法令及監督政策，來改善女性的地位。

對比於戒嚴時期大學校園內持續發展的民主抗爭，性別運動的樣貌又為何？六〇年代西方女性主義思想尚未影響臺灣，臺大學生關於性別的討論仍侷限在戀愛關係。例如王溢嘉在《大學新聞》發表〈不要女人的男人〉，另一名女學生則撰寫〈台大女郎缺乏羅曼蒂克味兒？〉，引發年輕人愛情問題的筆戰，但都未論及性別平權（鄭鴻生，2001）。直到 1973 年臺大法學院學生代表會（簡稱法代會）舉

辦「男性中心的社會該結束了吧」座談會，邀請剛回國的呂秀蓮主講，會場中討論熱烈，盛況空前。《臺大法言》隨後以〈新女性主義當「男」不讓，向傳統挑戰「女」非弱者〉之頭條標題報導此講座，將新女性主義的概念推向更廣大的受眾。當時為臺大學生的瞿宛文有鑑於女大學生多半「與現實隔離，缺乏社會意識，在社團活動中也無太大發揮空間」（鄭鴻生，2001：280），使用本名與筆名（如羅沙、羅瓊）發表多篇文章，大力呼籲臺大女生的自覺意識，以及應該多認識各階層婦女的實際處境。不過，在此時臺大校園政治中，女權仍然是邊緣議題，在校活躍的社團男生甚至以看笑話的態度將婦女議題視為「兩性之間的戰爭」，調侃女權運動者是失敗的女人，闖到男人陣營中打家劫舍（鄭鴻生，2001：282）。因此，當瞿宛文想再度邀請呂秀蓮參與「女人不再是弱者」座談會時，因法代會內部意見分歧，而被迫取消。

如前所述，解嚴前後儘管校園內追求自由民主的運動如火如荼，臺大校園本身卻瀰漫著父權思想。孫瑞穗表示，政治系的一名教授說：「今年政治系的招生狀況很不好，女生太多了。」陳怡伶就讀土木系二年級時編輯系刊，訪談系上老師，談到未來出路發展，感覺老師都是對著男學生說話。她刻意問老師，有沒有什麼話對女學生說，老師竟然回答，重要的是未來找個好老公。柏蘭芝則轉述歷史系男教授的發言：「有的更直接，甚至說妳們當不成湯恩比，<sup>4</sup>但可以當湯恩比的媽媽，因為他媽媽每天唸歷史故事給他聽，讓他變成湯恩比。」

在解嚴後追求民主的政治氛圍與開始反思父權壓迫的婦女運動脈絡下，處在如此受到壓抑、鬱悶環境中的女學生接下來將因緣際會彼

---

4 湯恩比（Arnold Joseph Toynbee, 1889-1975）為知名歷史學家，著有《歷史研究》（*A study of history*）。

此相遇，孕育一個以女性為主體的集結組織。

## （一）女性集結與意識啓蒙

### 1. 學運社團與婦運思潮的匯流：女研社成立經過

台大女研社究竟何時正式成立，眾說紛紜。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臺灣女人》網站的〈青春無敵，新女生向前走〉寫成立於1987年（不著撰人，無日期a），但〈校園中的女性主義社團——女研社〉則寫成立於1988年（不著撰人，無日期b）。這樣的差異，源自於對「成立」的界定不同。根據臺大課外活動組的紀錄，女研社於1988年4月30日正式成立，但是在成立之前，創社社員早已用社團名義聚集討論參與活動了。1987年婦女新知基金會成立之後，於12月出版的《婦女新知》（婦女新知雜誌社，1987：3）刊載〈關心婦運的新生代〉專題報導，封面人物即為黃麗玲、許郁蘭、曾昭媛。報導中寫道：「黃麗玲、許郁蘭、曾昭媛則預定在臺大校園，發起成立『女性問題研究社』……。」<sup>5</sup>

她們三人都是在1986年考上臺大。那一年的暑假，臺大的大學新聞社（簡稱大新社）、大學論壇社（簡稱大論社）、國際事務研習社，組織調查團到鹿港參加反杜邦設廠運動，最後寫成《台大學生杜邦事件調查團綜合報告書》。黃麗玲深受此學生行動感召，期許自己可以考上臺大並參加大新社。曾昭媛在聯考結束後和林夏如直接前往鹿港，不料臺大學生的調查活動已經結束，但她也因此結識大論社社長，一開學就與許郁蘭一起加入大論社。大新社與大論社的社辦都在

---

5 鄧丕雲（1993）寫道，女研社有個前身叫做「婦女自覺促進會」（頁231），但是我們詢問多位創社社員，並且上網搜尋，都不曾看到這個團體名稱。

學生活動中心的 238 室，黃麗玲認為 238 社辦裡「充滿了很男性的草莽氣息，講話會帶髒字，一定會抽菸哪。……言談上很男性，文化上有點不習慣」。<sup>6</sup>曾昭媛與許郁蘭在國中同學林夏如（到美國讀高中）的引介下，得以接觸不同的政治思想，並接觸環保運動、工運與婦運。當時走社會民主路線的民學聯與走議會民主路線的臺大系統有著路線之爭，曾昭媛參與大論社後，由於哥哥曾昭明是民學聯的重要幹部，她一方面被視為是曾昭明的妹妹（失去主體性），一方面又被視為雙面人或間諜（究竟是站在民學聯還是臺大這一邊），因此雖然能力強，卻很難在學運圈內生存。這種被排擠的經驗，讓她萌生籌組女性社團的念頭。她認為在「這一階段，先保持一個空間，可以讓女性安心與學習發表自己的意見，參與公共討論，是重要的」。這些學運團體關心的是政治運動、校園體制，黃麗玲表示有些議題例如家事計酬、人身安全、反性別歧視等，沒辦法與這些社團男生討論。籌組一個女性的團體成為她們三人的共同關切。大論社的學長徐進鈺轉介她們到土木研究所找張聖琳，張聖琳當時正在參與都計室的都市與婦女讀書小組。她們為了認識學運圈外的大學女生，又聯絡婦女新知雜誌社，並且因此結識就讀臺大歷史系的柏蘭芝。<sup>7</sup>可以說，女研社籌備

6 另一方面，黃麗玲遇到陳菊、徐慎怨（主婦聯盟創辦人）等運動女性，以及何春蕤、丁乃非、王蘋等女性主義者。她們從打扮、講話到想法，都是很不一樣的女性，給她很大的影響與啟發。親身遇見非傳統女性的典範，是形成性別意識的重要途徑（畢恆達，2004）。鄭美里也提及，1989 年自輔仁大學畢業後到婦女新知面試工作，見到當時的秘書長彭婉如，給她很大的震撼。她以前對於中年女性沒什麼概念，以為就像是媽媽、歐巴桑。彭婉如讓她看到了女性知識分子的形象，「原來四十幾歲的女性可以是這個樣子，可以很知性」。進入婦女新知工作後，參加親密營，目睹董監事可以一邊吃飯一邊談論月經，又帶來不小的衝擊。

7 柏蘭芝自陳在臺大校園遇到不愉快的性別經驗，有時候會向朋友抱怨，那時在

小組的核心就是她們五個人。

解嚴之後，社團解禁，一些議題性社團紛紛成立。她們得知動物系的陳文玲剛組建環境保護社，人脈廣，手中握有一份三十人名單（需要三十人連署才能成立學生社團）。於是一方面拉攏身邊朋友（像是大陸社的范雲雖沒有參與，也幫忙連署），一方面由陳文玲協助向臺大課外活動組送件。柏蘭芝表示，當時校方頗為頭痛，知道這些社團都是「搗蛋分子」，但是又不能不准，只能延緩文書處理的程序。校方原本想把這些新興社團辦公室都塞到活動中心不起眼的角落，但是女研社堅持要在活動中心 238 室（和異議性社團正面鬥爭），因此作業又拖了許久，直到 1988 年 4 月終獲准成立。成立連署名單雖然有三十人，但真正積極參與做事的人並不多。至於社長人選，張聖琳是研究生無法擔任，於是擔任顧問；曾昭媛遭到學運社團排擠，不希望新社團因此受到連累，最後是推舉比她們高一屆、策劃組織能力強的柏蘭芝擔任第一屆社長。

台大女研社的全名究竟為何？受訪者唯一的共識是「台大女研社」這個簡稱，對於全名卻各有不同的記憶與解讀。這裡有三個關鍵詞，分別是婦女、女性主義、問題。柏蘭芝認為「婦女」這兩個字聽起來就很老；<sup>8</sup> 許郁蘭、曾昭媛回憶，當年討論社名時，大家認為臺大婦女研究室的成員很不女性主義，而婦女新知雜誌社相對來說則是由一群中產階級、中年婦女所組成，因此選擇「女性」而不是「婦

---

淡江大學讀書的陳俊志建議她可以寫信給淡江大學教授李元貞。柏蘭芝曾在報紙上看過李元貞的名字，但並不認識她，於是寫了長達七頁的信給李元貞，並且收到李元貞的回信，邀請她參與婦女新知，後來再轉介給曾昭媛等人認識。

- 8 另外，在 1990 年婦女新知討論「兩性學研究中心」改名事宜時，柏蘭芝表示婦女是族群，而女性則是觀點與立場（李元貞，2014: 201）。

女」。她們雖曾考慮過「女性主義研究社」，但是擔心過於挑釁而作罷。曾昭媛受訪時說，依稀記得就像臺大當時有勞工問題研究社、大陸問題研究社、台灣問題研究社，一開始的社團名稱是女性問題研究社。曾昭媛在另一場婦運座談會上也說：「女性問題研究社……聽起來是學術性質的、不是來搗亂的」（陳正維，2012），似乎這樣比較容易為校方與外界所接受。

我們到臺大課外活動組查證後發現，<sup>9</sup>女研社登記的正式名稱為「女性研究社」。1989年2月女研社募款書上所蓋的官方社章，刻的也是「女性研究社」。然而，這並不表示受訪者記憶有誤。1988年3月出版的《婦女新知》（70期）刊載一則反對選美聲明，其中連署單位出現的是「台灣大學女性問題研究社」（頁9）。這些證據顯示，在草創初期，確實曾經使用女性問題研究社這個名稱。綜合起來，女研社社名的考量，一方面在於校方是否能夠接受，另一方面在於不要對外界造成過大刺激。柏蘭芝認為女性研究社是次佳選擇，這個聽起來弱弱的名稱，可說是最後妥協的結果。至於對內、對外更常使用的，其實是「台大女研社」這個「既不挑釁，又無問題二字」的中性簡稱。

## 2. 新女生與新女聲：性別理論的引介

八〇年代學運時期，由於社會與校園日漸開放，西方理論大量引進，各種主題的讀書會也遍地開花。孫瑞穗說：

當時學校裡提供的課程還是戒嚴時代的東西，很荒蕪，很無聊，

---

9 校方基於保護個資的理由，不讓我們查閱女研社當年連署的三十人名單。

讀書小組就成了當時新青年學習新思潮的模式。……戒嚴時代的白色恐怖，使得馬克思主義成為毒蛇猛獸，讀書會變成是唯一可以吸收到左翼知識和資訊的地方。

那個年代的女性主義理論幾乎都是原文，沒有中譯，她們抱著影印的講義猛查字典，也用女性主義的新角度檢視自己的生命經驗（鄭美里，2006）。

根據張聖琳、柏蘭芝、孫瑞穗等人描述，解嚴前後土木工程研究所都市計劃組（都計室）曾組織幾個不同的讀書會，閱讀（戒嚴時期不容易接觸的）左派書籍（如 Manuel Castells 的都市運動論述）。在這樣的脈絡下，1987 年博士生張景森因博士論文研究臺灣的都市規劃史，接觸到英美的女性主義地理學，找了碩士生張聖琳閱讀國外文獻之外，也做了臺北市婦女空間經驗的調查研究（張景森、張聖琳，1988）。除了都計室研究生（男女皆有）之外，黃麗玲、柏蘭芝、孫瑞穗等（當時都還是大學生，因修習「初等環境設計」課程與人脈因素，經常出入都計室）也有參與。就在這個讀書會期間，女研社正式成立。<sup>10</sup>

---

10 女研社創社之初，臺大除了外文系的黃毓秀、簡瑛瑛，以及人類系的崔伊蘭等教授之外，鮮少開設女性主義課程。受訪者咸認為 1985 年在亞洲協會經費支持下成立的婦女研究室過於保守，例如婦女研究室設在臺大人口研究中心底下，把婦女當作人口變項，缺乏女性主義的思考（李元貞，2014）。女研社因此與婦女研究室幾乎沒有互動，反倒是和建築與城鄉研究所（其前身為都計室）有深刻的連結。社員張聖琳（都計室時代）、黃麗玲、陳怡伶、柏蘭芝、孫瑞穗、杜歆穎、李宛澍、周君佩都就讀城鄉所。解嚴前後，相對於臺大法學院的保守，城鄉所更具批判意識。基於夏鑄九的人脈，何春蕤、卡維波、丁乃非、王蕓等人經常在都計室走動，學生們也聚在此討論相關議題。另一方面城鄉所承接多個縣市綜合開發計畫，有機會實地參與了解地方事務，掌握當地的



女研社成立之後，讀書會是重要活動之一。孫瑞穗提及由婦女新知鄭至慧所帶領的「社內讀書小組」，每週五晚上在 238 社辦舉行，閱讀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Der Ursprung der Familie, des Privateigentums und des Staats*）、陳芳明《謝雪紅評傳》、Rosemarie Tong《女性主義思潮》（*Feminist thought*）等書籍。張娟芬等則組成研讀女性主義基本概念的讀書會，針對強迫異性戀機制等概念，以及「女性主義就是敗在衣服和愛情上」（出自中興百貨廣告文案）等流行語，提出解釋，最後出版《誤解小辭典以及正解小辭典》（張娟芬，1991）。

掙角度讀書會<sup>11</sup>（歪字加上提手旁，取其搞歪、用另類角度看事情、重視行動力之意）則是另一個對女研社深具影響的校外讀書會。1989 年 10 月婦女新知雜誌社主編鄭美里，甫從大學畢業，深感人單勢孤，於是找了幾位新知義工，一起聚會腦力激盪（鄭美里，2006）。當時正在英國留學的新知社委成令方回臺寫論文，又有人轉介剛從美國柏克萊回臺的丁乃非、王蘋，加上義工拉來好友參與，

---

實質發展與政治運作；由於不是理論空談，而是在經驗資料的基礎上，能夠提出具體（空間／規劃設計）的建議，因此更能吸引嚮往結合學術與社會實踐的大學生。後繼者在學姊引介之下，相繼報考進入這個具有自由批判學風的研究所，也把女性主義帶入城鄉所，城鄉所與女研社彼此互相影響。根據張華蓀（2005）的研究發現，臺灣與空間相關的系所總共出版 74 篇性別議題的博碩士論文，其中有 38 篇出自臺大城鄉所。

- 11 掙這個字是丁乃非在《金瓶梅》書中看到的。在大學教育仍是性別理論荒漠的年代，掙角度的出現，讓許多其他大學女研社成員聞風而來。掙角度的成員也經常受各大學女研社邀請，到校園中放映電影、映後座談，在大專院校散播女性主義的種子。掙角度與差不多同時運作的臺灣第一個同志團體「我們之間」的成員有一些重疊，同時也促成「女性影像學會」的成立、《島嶼邊緣》〈女人國·家認同〉專輯的出版。

讓這個聚會成員從原本七八名的小團體，曾經陡升到七十名（鄭美里，2022）。<sup>12</sup>李金梅、孫瑞穗、柏蘭芝、陳怡伶、張娟芬、古明君等人都曾參與這個讀書會。有別於婦女新知的自由主義，她們閱讀了 Adrienne Rich、Audre Lorde、Luce Irigaray 等基進女性主義者的前衛思想，引發知識與生命的洗禮。成令方表示，那個年代有性別意識的女生都非常孤獨，找不到人談，參與掙角度可以暢所欲言，是一件獨特而快樂的事情。掙角度其實不只是讀書會，更是意識成長團體，那時她們最關心的議題是母／父女關係、身體情慾（掙姐妹口述，陶欣整理，1991）。鄭美里回憶說，讀書會進行的方式，有點體驗式的，不是純粹理論的研讀：「比方說 Adrienne Rich 那篇強迫異性戀機制，我們是用全身心的，好像把它吃進來，整個性別身心完全整個重來一次。不只是長出性別的眼睛，也是 self identity 的重新建構。」陳怡伶表示，當時閱讀的經典讀物，即使過了三十年，仍然印象深刻，非常受用。孫瑞穗認為掙角度讀書會是一個文化實驗，是一個「很 juicy 的運動過程」。

女研社成員除了自己吸取新知，也出版《新女聲》作為對外發聲的重要管道，由編輯經驗豐富的孫瑞穗擔任創刊號的總編輯。孫瑞穗受訪表示：

當時的大學都在搞校園美女的選美活動，很煩，女學生不被鼓勵讀書，而是被鼓勵打扮時髦，鼓勵變成有胸無腦的女人。我們一群人覺得自己不想與之為伍，我們是大學裡的「新女生」，新女

---

12 曹麗娟的短篇小說〈童女之舞〉，於1991年獲得《聯合報》第十三屆短篇小說首獎，讓掙角度成員振奮不已。討論這篇小說的聚會，參與人數達到最高峰。

生應該有新的女性聲音和思想，就取其諧音「新女聲」而成刊物的名稱。在沒有網路和 PTT 的時代，學生報紙是大學生了解身邊周遭訊息的重要管道，也是我們的公共領域和論述平臺。

《新女聲》的內容結合了女研社關懷的理論與實踐。理論文章除了自行書寫外，還透過翻譯來引介國外新知。書寫的主題亦配合女研社運動的方向，透過主題文章召喚並教育校內女學生，使得《新女聲》同時具有教育與宣傳的功能。不過對於議題尺度的拿捏仍小心翼翼，曾昭媛提到有一期《新女聲》原本討論要做女同性戀專題，但社員考量時代氛圍仍保守，擔心過於刺激與挑釁而作罷。

除了女研社自身活動的宣傳訊息之外，也向商家拉廣告，來為刊物挹注經費。然而廣告的功能，不僅於此。孫瑞穗說明，拉廣告本身是大學生生活的重要磨練。贊助商除了與學生生活相關的書局和餐廳，也刻意找了「支持墮胎權的婦產科醫院、支持性解放的青年旅社」，利用廣告傳遞女性主義訊息，協助大學女生解決親身所面臨的難題。

## （二）與傳統學運、工運間的矛盾和脫離

### 1. 女研社與進步男性：兩種學運的鬥爭

學運社團及工運幹部的陽剛與父權作風，是促成女研社成立的重要推力。張聖琳表示：「當時各種進步團體裡面，都有性別問題，就是女性很慘，女祕書做所有支持工作，最後都是男人上臺講話。」李金梅參與學運時，深刻體會到男學生習慣把傳統庶務（如畫海報）的工作交給女生，但是決策時又不重視女生的意見（廖和敏，1990）。

此外，曾昭媛也發現社團討論事情時，敢跟男生辯論的女生沒有幾個，因此在女研社成立之初，借鏡西方成長團體的運作方式，創造一個「讓女性可以自在安心的空間，不要擔心妳的發言內容是不是很笨，而不敢發言」是很重要的。誠如孫瑞穗所言：

如果我跟男友去參加社團，那個社團就會以我男友為主，我就變成他的女友而已，可是我在那個團體沒有角色。我在女研社就是社長，我是主角，我有角色。大學的時候正在發展主體性，這個你自己的角色是很重要的。

得知社團女性成員要另籌組女研社的時候，曾有男學生質問曾昭媛：「妳們這樣不就是要瓜分學運力量嗎？」當曾昭媛反駁道：「我們女生一起來支持工人、農民的權利，你們男生為什麼不能來支持女性改變性別不平等？」他們又會說：「哪有不平等！」曾昭媛表示，當時的學運、工運、農運無論是公開演講或撰文，都會強調「解放要有順序，無法同步進行……而工農階級解放優先於性別解放」。結果就是，「無論是民主派或民學聯派的，都說反正妳們性別要放在比較後面，不要瓜分運動的力量。這個不友善是現在參加社運的人無法想像的。」孫瑞穗（2016）則提及進步男性在眾人面前會表示支持女性主義，但是當性騷擾事件發生時，卻又質疑受害者；有女生因為宿舍夜歸門禁限制需要提前離開討論會場，他們會說這是個人選擇的問題。他們還會用自己的學術知識來指導女人，例如質疑女性自覺團體有分離主義的傾向；性解放論述有階級偏狹症；揭發兩性矛盾會引發對立，有本質主義的危險。

至於女研社創立時是否接受男性會員？<sup>13</sup>曾昭媛說：「我們一定會很 open 男生加入……但一定會問他是否認同女研社的宗旨。……但是真的有男生要參加嗎？大家就會哈哈……。」張聖琳說：「誰敢來啊。……進步男性我們就會批評他還不夠進步。在那個時代，哪一個男性是夠進步的。」<sup>14</sup>張娟芬則提醒我們：「要不要收男生，實在是一個非常瑣碎不重要的問題，我們不會花力氣去討論。」

然而，也有男學生出自於對女性主義感到好奇，想要參與，一窺究竟。1988-1989 年的女研社留言簿上曾有男生 GHC 想要加入：「希望透過和你們的研討，使我領悟一些我不以為意但是卻是有損女權的事。我希望加入貴社之後，能夠改變我一向做事的看法及態度。」後來在他的簽名底下，有社員留言：「這個男生還不錯，孺子可教也！」GHC 隨後為男壓迫女的論調辯解：「在一個男人主權的社會，女人不一定會吃虧。……有些女人反而因此很幸運。……女性壓迫男性的例子也是歷史上早有的，如千金小姐壓迫長工。……不平等一定存在，因為只要是不同的東西就不可能一樣。」文章的周圍留白處，又有女社員加了很多回應的註解，以及在「長工」的旁邊加上「那長工的太太呢？」這種男性使用性別論述的語言來質疑婦女運動的實例，對女研社的成員來說是經常需要回應的課題。

周克任是女研社創社時期由孫瑞穗引介加入女研社的男生。他表示解嚴之後，整個社團的氣氛都進入學運的狀態，任何跨社的討論會議，也都深受女性主義思潮的影響。他認為：

---

13 〈校園中的女性主義社團—女研社〉一文中提到女研社「不收男社員，是為了提供一個專屬於女人的空間」（不著撰人，無日期 b）。

14 張鐵志曾回憶道：「我們這些自認為進步的學運與知識青年受到很大衝擊，恐慌地想學習如何可以快速脫離沙豬身分」（李維菁、張鐵志，2017）。

那是有最多時間接觸不同思想與看書的自在時光。……參加活動後，必須經歷很多思想的衝擊或是攻擊。不僅僅是性別問題，還會牽扯到人際關係問題，完全糾葛在一起。……思想面對翻轉時，彼此總會想盡辦法要把彼此剝到赤裸裸狀態，所以參與活動是充滿緊張感。

一開始都會直接了當表示懷疑參與動機，因為被問的男生一定會腦袋打結，翻出一堆自己也不會相信的理由，對女性幹部而言，這是很有趣的入門遊戲。而女性的私密空間那一塊，當然男性不能參加。所以，男生大概參加不會太久，自然也會不太參與活動了。畢竟，並未被視為真正參與成員，高頻率重複的被批判下，自身會察覺失去參與主體的感受，疏離自然也要發生。

曾任女研社社長的劉慧君也在《新女聲》撰文說明：

自覺過程往往只容女性參與，不歡迎男性旁聽，因為女生的經驗常是男生無法體會的，不論男生如何誠懇，仍祛除不了既定男看待女的方式，誤解、異樣眼光（過度同情或輕視嘲諷）只會使孤立的個別女人受到傷害。……純女性的團體是唯一能放鬆的所在，誠懇的男生們忍心以「形式上的男女平等」之由剝奪這個空間嗎？（劉慧君，1991: 4）

當時女性主義仍然屬於新思潮，而有些男性出自於知識的興趣研讀女性主義理論，沒能深刻地反省自身的性別關係與經驗，更別提日常生活中的實踐，以至於受到女性的批評。1991年學運社團「制憲聯盟」邀請女研社在暑假營隊中針對「運動中的性別權力關係」設計

課程並舉辦座談。女研社提出「兩種學運的第一次接觸」，認為關注政治議題的是學運，關注性別議題的也是學運，應該平起平坐。張娟芬表示：「女性主義對於學運充斥性符號提出挑戰，但是男性並沒有要回應這個挑戰，而且對於男女分組的活動設計高度戒備。」結果男女之間的討論效果不彰，學員彭興漢感嘆：「女研社……的談法使許多在場的男性覺得『面子上掛不住』，所以產生了『為反對而反對』的反效果。」座談主持人鄭麗君則認為：「男性……慣以第三者的角度來討論婦運策略應該如何，而沒有能意識到其實自己是當事人，應該內省而不是去指導別人」（台大女研社，1991：1）。

## 2. 性別與階級：運動路線設定的轉換

女研社的創社社員一開始幾乎都很關心女性勞工。孫瑞穗在《新女聲》創刊號上就寫道「集體下鄉」以及「與基層婦女接觸」是婦女解放實踐的開始，也可以打破學院與社會的區隔（台大女研社，1988）。1988年2月新竹縣新埔鎮遠東化纖廠因年終獎金爭議爆發集體怠工事件後，女研社的核心成員，包括張聖琳、柏蘭芝、許郁蘭、曾昭媛、黃麗玲、孫瑞穗等都參與了臺大桃竹苗工運調查隊，幫忙組織女子工會，爭取女工應有的薪資與生育補助。張聖琳（1989）也以此田野撰寫碩士論文。

柏蘭芝講述當時光是來往交通就異常艱辛，她一開始和許郁蘭搭慢吞吞的公路局客運，一路轉車到新埔，跟工廠女工讀《勞動基準法》，講性騷擾、工會組織。後來因為孫瑞穗有摩托車，變成她們兩人騎著車跑來跑去。柏蘭芝也發現在工運論述中，女工是被邊緣化、是缺席的，紡織廠的女工會被動員來參與工運，但是沒有人位處幹部的核心。她形容參與工運是一場震撼教育，是肉搏戰。比如聲援工運



的時候，運動現場在跳牛肉場，要在現場抗議嗎？菸要不要抽，酒要不要喝？不會喝酒的女大學生，在工運現場就像是叢林中的小白兔。頻繁發生的性騷擾，<sup>15</sup>也讓女學生要在實踐中學習如何保護自己。這些工運中的現場觀察，也讓柏蘭芝體會到女工生命中面臨的困難，除了職場，家庭同等嚴重：

她們作為工人的身分，但是每天都要遭遇性騷擾、遭遇家庭暴力、遭遇離婚的時候監護權是誰的問題。婦女的問題不都是中產階級的問題，說家暴、性騷擾是中產階級問題是根本不了解工人。不管是做性暴力或什麼，完全沒有比工運不重要，或者在 priority 或 agenda 上要比工運不重要。也必須承認說我們那時候少不更事，搞了那攤之後，後來女研社再也沒有跟工運扯上關係了。

曾昭媛也反省到，與男性工會幹部交流（也就是喝酒聊天），會聽到他們非常傳統性別刻板的想法（例如女工就應該留在家裡相夫教子之類的），看到他們對待女性工會祕書的輕蔑態度，雖然敢質疑，但是難以孤軍奮戰。而面對女工的時候，又難脫自己知識分子的氣息，除了連續劇、言情小說之外，不知道能夠和她們聊什麼。最後這些女研社成員決定回到校園，將心力投注在校園女性面對的議題上。女研社社長陳明秀（1990）即撰文表示，「回到校園，回到女學生群眾」將是女研社該學期努力工作的方向。

除了上述階級差異、性騷擾等因素之外，遠東化纖罷工事件的潰

---

15 舉例來說，曾昭媛提及，曾經看到工運幹部開女大學生身材的玩笑，甚至摸女學生大腿。

敗也是重要因素。女研社社員懷抱著熱情與理想，親身投入罷工的現場。她們的近身理解是，很多底層勞工參與這個罷工運動是基於兄弟姊妹情誼，而不是那些不在現場、不必承擔運動失敗嚴重後果的左派知識分子所標舉的階級革命。此外，張聖琳說那些男教授不熟悉運動現場，竟然要女學生幫一名有性騷擾前科的工運男性幹部競選，被她們斷然拒絕。最後，運動以失敗告終，與她們緊密合作的工運幹部全遭解雇，參與工運的女工也遭資方以各種藉口（例如辱罵工頭等）解雇。女研社社員面對工運的失敗，看著底層勞工為此付出慘痛的代價，但是卻無能為力，讓她們非常心痛、自責且受傷。即使事過境遷已三十年，仍然可以感受到她們情緒的波動。在這次的傷痛經驗之後，女研社就與工運拉開距離。

### （三）校內女學生運動的路線轉向

#### 1. 校園女性議題：身體自主與人身安全

女研社雖然是大學校園中的第一個女性主義社團，卻不是最早的女性社團，<sup>16</sup>張聖琳說：「之前的女學生團體，都是家政、聯誼、化妝，非常溫良恭儉讓。」女研社寧願花時間與女工站在一起，完全沒有興趣和時間與那群「婦聯會的女兒們」吵架。

女研社下鄉回來之後，就把議題拉回校園。<sup>17</sup>九〇年代，臺大

---

16 例如女青年社，引自范雲在2018年女研社三十週年座談會的發言，取自本文第一作者筆記。

17 孫瑞穗提到另外一個影響因素是，當時女研社的成員人數不多，能做的事情有限，社長（或其他重要幹部）的關切、資源與人脈，就會決定社團議程設定的走向。

女生宿舍舍監在晚上十一點半就會將大門關上，進宿舍必須請舍監開門。其實真的想外宿的人會早做準備，反而是打算回宿舍的人，會因為各種意料之外的原因晚歸而被關在門外，像是從南部返回遇到大塞車，或者打工收班受到延誤（引自王善卿<sup>18</sup>）。女研社社員利用下鄉時學會的田野調查技巧，聯絡住在女舍的舍友，進行問卷與空間調查，也定期在宿舍放電影，討論性別議題。孫瑞穗與李宛澍也以在城鄉所修課之便，主持一個全校女舍調查，主題包括空間配置、住宿管理規則、是否認同宿舍是自己的家。

當時為中文系學生的王善卿表示，基於夜歸安全以及教官過度介入宿舍事務的問題，她因此出來競選學生宿舍生活自治會（簡稱生治會）的總幹事，推動解除宿舍門禁。彼時剛解嚴不久，冰宮、夜店都算是不良場所，家長認為不管是補習、家教或看電影都不會太晚，沒有理由十一點半了還不回宿舍。「遲歸的女學生總是會被貼上一張行為不檢的標籤」（劉欣蓉，1992: 83）。推動連署時，明明很多人支持，卻不敢簽名表態。後來就改以寢室號碼來連署，不會洩露人名。王善卿感慨，有人就是將解除門禁等同於性解放。她觀察到當時反對的意見大多出自家長、校方和媒體，但最大的挫折是當時的舍民沒有參與公共事務的意識，不願意站出來。於是，宿舍生治會持續辦理門禁說明會、門禁問卷調查，《新女聲》第12期也出版〈門禁與安全〉專刊（台大女研社，1993），刊載女宿舍民的「心情寫真」。然而王善卿表示，1994年3月6日發生的「女三舍強暴疑案」事件，發揮了關鍵的推動角色。此則疑案「造成舍民大恐慌」，封閉式宿舍的安全遭到質疑，「門禁變成非常切身的安全問題，所以激起比較多舍民

---

18 取自王善卿 2017 年 11 月 28 日在教育廣播電台「性別教育 Easy Go!」的專訪。

的主動積極參與」，並且引來立委、監察委員與媒體的關切。在民心可用的情勢下，運動的操作避開「女生的行動自主權」的遊說，而是以「改磁卡＝顧安全」來得到舍民的支持，「學生會因為剛好站在這個天時地利人和的點去施壓」，才獲校方同意解除門禁，改以磁卡進出。

此外，陳怡伶善用在土木系修習初等環境設計課程所學到的空間規劃設計知識，在女生宿舍張貼臺大地圖，希望女學生能夠在地圖上圈出曾經發生人身安全疑慮的地點，並期待校方公布相關資訊。1990年5月22日一名女研社社員在校門口順手撕下一張反制學生運動的海報，旋即遭一名騎機車、手持扁鑽的陌生男子劃傷臀部。該生雖想反擊，但憚於對方有武器，於是快跑到校門口警衛室求助，但警衛沒有報警也沒有回報。當時正值下午，校園裡沒有什麼人，她自行到醫務室求助縫合傷口。事後女研社朋友們都很生氣，認為找不到求救管道，整個校園安全系統失靈，決定呼應清華大學<sup>19</sup>成立小紅帽組織。她們以女生了解女生、女生幫助女生的想法，希望每一名宿舍女學生都成為小紅帽。小紅帽在校門廣場舉辦說明會、以沿路尖叫方式遊行至行政大樓、在曾經出事地點綁紅布條、在女生宿舍播放相關電影、繳交連署書、舉辦安全會議。黃毓秀等教授也參與連署、在校務會議提案，督促校方研擬具體校園安全措施（台大女研社，1990b）。其後校園內又陸續發生教授課堂性騷擾、圖書館性騷擾（台大女研社，1993）、女生宿舍性侵等事件。校內累積已久的行動，導向校務會議通過成立性別歧視與性侵犯防治小組。

---

19 清華大學校園在1990年春出現清大之狼，清大女研社發起小紅帽運動，抗議性騷擾與性暴力（台大女研社，1990b）。

## 2. A片事件

1995年5月發生的A片事件是台大女研社博得最多媒體版面與討論的活動。然而，王慶寧認為這則轟動臺灣的事件部分起因於「歷史的偶然」。情慾自主是女研社在九〇年代初期推動的重要議題，成員想要找回女性的主體位置，討論情慾自主時也會討論情慾的素材。她們在偶然間聽聞男生宿舍的福利社每週都會播放A片，作為回饋給消費者的福利，既驚訝又生氣。A片是男生探索性的重要管道，但是其中也充滿性的偏見。女研社於是開始討論要在女生宿舍看A片。「A片影展」的活動宣傳上寫著：「我們希望這個活動，不僅能進一步了解A片文化，而且能引發校園中女性的情慾自主，身體自主的討論。」伍維婷表示，其實一開始張貼海報就受到校方刁難，女研社強調這是學術性質的活動，並且請張小虹老師擔保，學校才放行。由於該活動並不限校內的學生才可參加，有社員想到當時主流報紙的副刊版面底下有個免費刊登活動看板的方塊，就寫了簡短的活動介紹傳真到報社，沒料到記者誤以為這是邀請採訪的新聞稿。當天主流報紙以頭條新聞報導這個活動，第二天台視、中視、華視三臺的記者都到臺大採訪女研社社長王慶寧。杜歆穎表示，本來是想在臺大校園內造勢，才會安排這個活動增加曝光率，但是沒有預期會有校外的媒體進來。接著引發的社會輿論，更在意料之外。

媒體大肆報導（如林人芳、程紹淳，1995；聯合晚報，1995a），引發社會關注。臺大校方受到社會壓力，卻又不能直接禁絕，只能採取技術性警告，提出在公共場所公然散佈猥褻物品可能觸犯《中華民國刑法》與《社會秩序維護法》，以及沒有事先取得片商同意，涉及侵害著作財產權。女研社研商如何避免觸犯法令，採取技術性回應，有關是否「公然」，採取門禁管制策略，必須出示臺大證

件才能進入放映現場，有關著作財產權，則決定只放映影片的片段而非整部。

王慶寧感嘆，當時的媒體把女生看 A 片帶往娛樂性方向，迫使女研社將活動改成「A 片批判大會」。「批判當然本來就要，但是結果卻隱匿了情慾自主的主題。」由於要討論 A 片中物化女性的問題，選的是主流的 A 片，包括日本三級片《新說白雪姬》、美國 A 片《屌妹絕技大搜密》和日本 A 片《新宿壞女孩》（楊蕙菁，1995b）。雖然來自校方和社會輿論的壓力頗大，女研社堅持絕不取消，後來總共放映三場，在法學院女七及校總區女三各辦一場；女一舍是最後一場，由張小虹、劉毓秀老師主持映後「學術研討」（楊蕙菁，1995a）。

贊成與反對方紛紛投書報紙表達意見。例如：教師李玲茹（1995）投書指出，只要稍有羞恥心就不會公開看 A 片；女人爭自主、爭地位的管道很多，不需要在「性」上打轉。研究生念淮（1995）則認為女生為了「了解自己如何被那套（A 片中的）刻板印象定位」，當然需要看 A 片。整體而言，社會輿論可以聯合報系的三篇社論作為代表。A 片影展前的《聯合晚報》（1995b）社論，先是肯定大學女宿放 A 片可以「達到揭露父權社會壓抑女性性自覺」的效果，呼籲社會反省男人的性扭曲與性暴力，結論卻是 A 片影展已經達到引發大眾注意的效果，但仍然是「違法、悖德之舉」，可以適可而止。《民生報》（1995）的社評表示，臺大女生放映 A 片不只有觸法之嫌，也有道德疑慮。過度強調情慾自主會助長畸形或偏差性觀念的流行。A 片放映之後的《聯合報》（1995）社論，則以 A 片的「黃」對比《完全自殺手冊》（《完全自殺マニュアル》）的「黑」，認為 A 片只是重複的性動作影像，會「抹殺了人的個性與自主性的尊嚴」，排除了「任何自省與藝術的可能性」。

A 片放映活動結束之後，女研社與指導老師張小虹、劉毓秀舉辦記者會，會場高掛的布條上寫著：「身體自主不是性解放。」為何要與性解放劃清界線呢？女研社創社之後曾經多次邀請何春蕤、甯應斌（卡維波）演講，1990 年的「大專女生姊妹營」也邀請何春蕤、王蘋授課。何春蕤在 1994 年反性騷擾遊行上呼口號：「我要性高潮，不要性騷擾。」孫瑞穗認為：「其實從運動內部來看，反性騷擾和追求性自主，根本就是一體兩面，同一個解放過程，沒有什麼好分裂的。」造成衝突的，反而是媒體的效應。媒體過於關注性高潮，忽略了對於性騷擾的討論。彼時女性學者正努力要向社會大眾溝通「性騷擾」所涉及的權力、階級、性別等複雜關係，當大眾還不清楚性騷擾的意涵時，性解放轉移了大眾對於性騷擾的理解。大眾對性自主仍認識不清，且視女性情慾為禁忌，在這樣的運動脈絡下，女研社認為要與（宿舍）女生群眾對話，不宜使用太高深、激進的語言，論述必須經過包裝才能夠溝通，這樣保守的世界才有可能往前進一步。

#### （四）走向主流化的臺大校內性別建置

##### 1. 競選學生會會長

A 片事件之後，女研社社長王慶寧當選第八屆臺大學生會會長。歷年來校內改革性社團以參選作為校園民主運動的策略，串連共推候選人。古明君說：「從創社時期，台大女研社就會被學運社團找去談（喬）共推會長選舉，邀請一起加入競選的工作。」女研社成員杜歆穎過去曾經擔任競選總幹事，成功輔選過二任學生會會長（黃國昌、許家馨），有一次女研社內部討論到為何總是幫人競選，何不自己推出候選人。A 片事件後，女研社的聲勢達到高峰，加上改革性社團推



不出共同候選人，王慶寧即順勢參選。雖然是參選學生會會長，但是對女研社而言，這也是一場喚醒校園性別意識的運動。《新女聲》中表明：「舊（男）學運已死，校園已不再以政黨意味濃厚之改革派／非改革派之區分方式做為選戰唯一出路」（台大女研社，1995: 1）。文宣得到城鄉所研究生的協助，除了身體、性傾向之外，也涵蓋宿舍、廁所等空間議題。

沒有政黨背景的王慶寧能當選，除了國民黨派與改革派多位候選人彼此分散票源之外，獲得女生宿舍的支持是原因之一。女宿廢除門禁運動乃至 A 片事件，女生宿舍的舍友一直是「回到校園」後的女研社用心經營的群眾。伍維婷認為對女研社來說，選舉的目標不是一定要贏，而是如何捲動校園女性關心性別議題。女研社因此花了許多時間到宿舍發放文宣，也為了讓更多群眾覺得有趣，製作星座主題文宣。文宣瞬間遭搶光，還有學生狂蒐，想要集滿十二個星座。增設女生宿舍投票所也是那時爭取來的。女研社的經營成果，最終展現在學生會會長選舉的得票之上。王慶寧勝選打破了過往國民黨與非國民黨對抗的框架，柏蘭芝認為是女研社的性別運動成果取得主流化的重要成就。

隨後的學生代表選舉，發生「強迫曝光事件」（張娟芬，1998）。臺大社團建國俱樂部成員黃博群與蔡政良在小福廣場的布告欄上張貼〈讓我們在陽光下做朋友——請同性戀朋友走出黑暗〉、〈讓我向你說聲抱歉，愛人同志〉等文宣，並在課堂上發放黑函，直接點名曝光多位學代候選人之性傾向。伍維婷認為，這應該是有些社團認為女研社不受控，感到挫折之後的反應。此外，學生會陸續舉辦「一連串向禁忌挑戰的活動，包括臺大椰林扮裝舞會、同志藝術季等」（張娟芬，1998: 63），引發性別保守勢力的反撲。

學生看到熟識的同學被強迫曝光，也不知如何啟齒關切。女研社在討論回應之道時，現場氣氛低迷沮喪，比較擔心的是父母的反應，覺得憤怒與不公平。不過，當時大新、大論都支持女研社。女研社最後決定使用輕鬆嘲諷的方式，說他們兩人其實也是一對，如果願意出櫃，社員很願意跟他們做朋友。九〇年代同性戀在社會中仍存在巨大污名，張娟芬分析，如果把事情鬧大反而會傷及同志。

王慶寧擔任學生會會長之後，兌現競選政見，與城鄉所性別與空間研究室合作進行「臺大女廁總體檢」，接下來再與全女聯合作推動女廁運動，<sup>20</sup>促成女廁便器數量法規的修正。女研社社員范晴嵐（1999: 3）認為女研社「似乎是從『A片事件』開始下墜，『女廁運動』為終結的」。她認為女研社內的學運能量與向心力隨著社會思潮的趨勢而消散，同時女性主義理論流派眾多、女性議題多元，除了要面對父權，還要處理資本主義、異性戀霸權，意見難以統一，只好互道珍重再見。

## 2. 女性主義研究社

九〇年代臺大校園內的性別建置有些改變，逐漸趨向分眾化、主流化。1993年男同志社團GayChat成立、1994年女同志社團Lamda成立、1995年城鄉所的性別與空間研究室成立、1997年通過婦女與性別研究學程、2004年校方的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成立、<sup>21</sup>2009年學生會成立任務導向的性別工作坊，此外各系所性別課程也逐步增

---

20 女廁運動已有許多論述出版，例如彭淦雯（2006）〈從女廁運動到無性別廁所——一個參與者的反省〉。

21 臺大於1994年成立性別歧視與性侵犯防治委員會，2000年成立兩性平等委員會。

加。表二整理了九〇年代中期之後，臺大校園曾經發生的性別事件，這些性別議題的推動大都已經不是由女研社來主導了。

表二：九〇年代中期後臺大校園的性別事件

年	事件或活動名稱	活動內容
1994	給我女教授運動	有鑑於社會系理論組的老師都是男性，系上的女學生成立「給我女教授聯盟」。1995年第一位女教授曾熾芬獲得聘任（陳東升，2020）。
1995-	GLAD（Gay and Lesbian Awakening Day，校園同志甦醒日）	由臺大的GayChat與Lambda聯合北部校園同志社團，挪用異性戀思維下的端午節，藉由各種文化活動，創造屬於同志的節日（高穎超，2006）。
1999	臺大性別空間總體檢	由性別歧視與性侵犯防治委員會委託性別與空間研究室承辦，活動內容包括問卷調查、繪製校園危險地圖、攻佔籃球場、越夜越美麗（夜間危險空間巡禮）（畢恆達等，1999）。
2000	白絲帶運動	由婦女研究室委託性別與空間研究室承辦，舉辦座談會、徵文、製作男語錄、召開記者會，以反思男性氣概養成過程，並鼓勵男人參與終止性暴力（畢恆達，2000）。
2006	女性優先籃球場	性別與空間研究室曾於1999年的性別空間總體檢的活動中倡議，無果。後經由性平會的學生代表在會中提議，校長指示體育室辦理，於是設置一處女性優先籃球場（鄭育婷，2015）。

2007	鵲的卡	社會系孫中興教授的課堂助教提出，女性因為有月經期，游泳池的月票應該打八折。孫中興向校長提議、舉辦公聽會，引發更多校園課堂討論，以及立法委員的關切，性平會提出男女皆可申請的鵲的卡（引自孫中興訪談）。此卡現已廢除，改成回數票。
2005-	性別友善宿舍	2005年性別與空間研究室在成立十週年的活動中，倡議男女合宿。2009年臺大學生會性別工作坊在總圖前草坪夜宿帳篷，爭取設置性別友善宿舍（陳怡靜，2009）。十餘年後，校方仍在研議中，幾無進展。
2015-	性別友善廁所	2015年臺大學生會性別工作坊舉辦調查、座談，並聯合校園規劃小組 <sup>22</sup> 提案，經行政會議通過《性別友善廁所設置辦法》（黃麗玲，2017）。

如是，在臺大校內性別運動後續的發展中，女研社慢慢淡出運動的中心位置，轉型成為研讀與討論女性主義理論的學術性社團，因此男女社員人數差距不大，有幾屆是由男社員擔任社長。葉峻成表示，在女性主義課程中其實經常遇見性別相關社團的社員，但是由於課程專注於文本內容，或者課堂討論的時間有限，參加女研社可以增加討論的深度。除了學習理論，也可以和社員交換、討論日常的性別經驗以及周遭發生的社會事件。近年來女研社的社員大約十餘人，日常運作除了社課（演講或讀書會）之外，也定期與女書店合作舉辦講座，出版《女研 fem 青》刊物，與相關性別社團合作（如連署、網路發文、發新聞稿等），討論社會性別事件（如同婚公投、MeToo 事件、林奕含事件、輔大性侵事件等），以及參與社會運動（如同志遊行、

22 黃麗玲擔任校園規劃小組召集人期間，推動性別友善廁所，出力甚多。

反核、318 學運、巢運等)。長期以來，一直有社員討論是否需要更改社名，因為「女性研究」地位不明。臺大杜鵑花節時，曾有高中生以為女研社是一個認識女生、和女生交流的地方。2021 年女研社在社員都沒有異議的情況下，正式向校方申請更改社名為「女性主義研究社」，不過口頭上仍然使用大家所熟知的台大女研社這個簡稱。

## 四、結論

如果將女研社成立視為一個小型的社會運動，那麼此運動之得以形成，來自於大學女生對於性別壓迫結構的不滿，加上政治機會結構的改變。解嚴前，國民黨政權的政治管制逐漸鬆綁，除了黨外運動，環保自力救濟以及勞工與婦女運動逐步活躍起來。臺大校園則有爭取言論自由的校園民主運動，學生也組團調查杜邦設廠事件。解嚴之後，解除報禁、黨禁，民間團體紛紛成立，臺大校園的社團解禁，台灣勞工事務研究社、環境保護社、女性研究社等學生社團相繼成立。此時，參與抗爭的風險降低，不會因此身陷囹圄。女學生的不滿是針對大學校園內的教育體制將女學生視為次等，而在異議性社團內又扮演服務者，能力遭到忽視。李金梅認為，女研社早期的成員有別於 1960 年代美國中產階級婦女對於婚姻、生活感到懷疑與厭倦，她們更關注在思考未來人生的發展以及女性集體的出路。再者，同樣都是學生社團，所面臨的政治機會結構卻是「性別化的」(gendered)。學運、工運被視為具有優先性，女研社則遭責怪搶奪了有限的學運資源。儘管女研社意識到「性別做為一個壓迫範疇」(張娟芬語)，女研社的出發點卻是性別與階級的交織。《新女聲》創刊號的發刊詞就直接寫著：

中產階級色彩鮮明的〔婦女〕團體，始終無法與廣大的勞動婦女產生互動，以由下而上的運動方針組織出有力的婦運團體，也無法成為社會運動中的主流。……因此，投向不同領域的勞動婦女，結合所有受到父權制度和資本主義雙重壓迫下的中下階層女性，是突破婦運困境的唯一道路。（台大女研社，1988: 1）

女研社除了支持婦女團體舉辦的救援雛妓遊行之外，更是積極參與遠東化纖廠的罷工抗爭。然而在罷工運動失敗之後，女研社決定回到校園關心女大學生的切身問題，包括人身安全、情慾自主、宿舍、親密／親子關係。經歷九〇年代性別主流化、分眾化之後，女研社又回到側重學術研究的位置。

女研社雖然位處大學校園，但是運動的夥伴以及召喚的對象卻不侷限在臺大校園。女研社身處在多種不同的關係交織成的網絡中，發展出自己的運動軌跡。她們所面對的群體課題大致上可歸為以下五類：

#### （1）如何與大學女生對話

女研社的成立宗旨為：「研究女性問題，省思兩性角色。喚醒女性意識，創造兩性平等新社會」（資料來源：國立臺灣大學課外活動組）。不只要解決社員的個人問題，更要轉變社會的性別結構，改善集體女性的處境。從實務上來看，女研社需要持續吸收新社員加入，社團才能延續；從運動的目標來看，則要與廣大的女學生對話。因此藉由在宿舍放映電影、舉辦座談，討論親子關係與身體自主等議題；藉由出版《新女聲》與女學生進行理論對話；藉由抗爭運動解除宿舍門禁、建立校園安全系統。然而，要講女學生能聽入耳的語言，修辭

與運動策略需要經過包裝，例如社名不宜使用女性主義，先釐清性騷擾的概念而不急著談性解放等。此外，如張娟芬所言，在創社初期女同志就像生活般存在，是女研社中很自然的文化氛圍的一部分，但是大家心照不宣，即使看到不一樣的女生來加入社團，也只敢猜測而不敢問，「不會把同性戀議題當成公共議題去處理，所以同志議題不會浮上檯面」。她認為女大學生在這個年紀「其實對情慾很有感，所以女同性戀議題在掙角度比較明確，從那裡再帶回女研社」。

### （2）與學運社團間的矛盾關係

至於女研社與男大學生的關係，在當時的時代脈絡中能夠身體力行性別平等的男性絕無僅有，性別論述也不及女學生，然而女研社與學運社團保持著既抗爭又合作的關係，共同合作舉辦營隊、一起推選學生會會長候選人等。女研社也在參與學運過程中學習田野調查的能力。雖然女研社認為關注性別議題也是學運，但學運男性成員顯然還無法意識到自己在性別結構中的位置。

### （3）女學生社團間的合作與聲援

除了在臺大校內的倡議與行動之外，女研社也積極連結她校學運社團中的女性。誠如古明君所言，女研社「很有意識地要以各校女研社為組織聯繫的對象，如果有些學校還沒有女研社，但是學運社團中有女學生，我們也很積極聯繫，聯合辦一些活動，推動該校成立女研社」。以掙角度讀書會作為中介，吸引各大學的女學生。野百合學運期間，可以看到臺大系統、民學聯系統的男性們在臺上指揮，廣場靜坐的大學女生已屬積極主動，但相對於男生仍然是沉默族群。更令人扼腕的是高中男生自由組團聲援，高中女生卻受到重重限制。各校



女研社的女學生於是組成「全國大學女生行動聯盟」（全女聯），鼓勵高中女生參與學運。她們到高中女校附近發放〈女孩，妳可以改變歷史！〉傳單，引發校方反彈。北一女中還要求學生不得在校外討論國事（台大女研社，1990a）。隨後，來自各地的女大學生深刻體會到社會中存在性別問題，期待能夠以集體的力量來解決，於是在婦女新知資助下，於1990年9月舉辦「大專女生姊妹營」，匯聚了多校的大學女生一同學習、共同成長。社團成員也經常跨校，彼此聲援電影映後座談或演講。其後的1994年522女人連線反性騷擾大遊行及1996年的女廁運動，也都是各校女研社集體合作的成果。

#### （4）與婦運、社運間的資源相互流通

女研社雖是校園內的學生團體，但是與校外的婦女團體（尤其是婦女新知）密切合作。一方面，婦女新知希望有更多年輕世代參與婦運、培養接班人，另一方面婦女新知可以提供女研社所缺乏的社會人脈與物質資源。女研社聲援婦女團體舉辦的各種抗議活動（如救援雛妓遊行、反選美），參加婦女新知的讀書會，在《婦女新知》月刊發表文章，聯合各團體舉辦反性騷擾的演講與遊行。婦女新知則提供資源及講師支援大專女生姊妹營。孫瑞穗提到，因為婦女團體的人脈，女研社社員在大學生的年紀就可以親身接觸從禁書與黑名單中跳出來的女性政治犯、女性受刑人，擴大她們的人生視野。

#### （5）在性別主流化、分眾化的建制環境中協力

隨著性別運動的發展，各種不同的性別團體與制度也逐漸在校園內聚集與建制，比如同志社團、城鄉所性別與空間研究室、性平會、學生會性工坊，協力推動性別平等。近年內有許多性別運動與議題是

在體制內推動，如女性優先籃球場、鵲的卡、性別友善廁所等。女研社回歸一起讀書、交換生命經驗的角色，同時參與校內外相關的活動。

孫瑞穗比喻，女研社就像是無線電的路由器（router）。一方面是人群的連結，從橫向連結女生宿舍的舍友、校內的異議性社團，到各大學關心性別的女大學生，再到縱向連結各婦女組織。這些連結，反對由上對下、獨裁式的操控，也表現了互惠分享的姊妹情誼。連結的另一面是跨越。張娟芬指出：

〔女研社成員〕是啟蒙很早的女性秀異分子，但是在參與女研社的過程裡試著跨越階級分野去了解女工，試著跨越生命經驗的分野去了解單親媽媽，試著跨越性格氣質的分野去接觸住宿舍的女生，試著跨越性傾向的分野去探索情慾。

女研社結合了理論與實踐，在追求民主的年代中，讓性別運動深入大學校園。她們從參與工運的經驗中學到扎實的田野調查方法，從婦女新知學到意識成長團體的運作，從城鄉所的課程與讀書會中學到空間規劃和設計能力，讓這些不同的活動領域相互增益。從社會運動的角度來看，女研社的出現不只是對抗校園的父權結構，同時也在與同世代的異議性社團對話的過程中，帶入一種從性別角度出發的校園民主視野。從性別運動的角度來看，女研社不只在當下引導眾多議題的發展，同時也培育了未來新一代婦運的新血。許多成員在畢業後投身不同的性別運動組織，或是進入學院繼續傳播女性主義理論的種

子。23

臺灣性別運動近年來逐漸往建制化發展，台大女研社也順著這個軌跡，從體制外運動者的角色上逐漸淡出。即便這個學生社團已經不在性別運動裡擔任議題帶領者的位置，女研社仍為年輕的女性主義學子們提供一個理論與實踐交會的空間。

---

23 曾昭媛曾在婦女新知擔任資深研究員，許郁蘭曾在「阿嬤家——和平與女性人權館」擔任副館長。黃麗玲、張聖琳、柏蘭芝、伍維婷、陳怡伶、古明君等都在大學任教。

## 參考文獻

- 不著撰人（無日期 a），〈青春無敵，新女生向前走——全國大專女生行動聯盟（1991 - ）〉，《臺灣女人》。取自 <https://women.nmth.gov.tw/?p=2109>
- 不著撰人（無日期 b），〈校園中的女性主義社團——女研社〉，《臺灣女人》。  
取自 <https://women.nmth.gov.tw/?p=2132>
- 王秀雲（2004），〈評介王雅各：《臺灣婦女解放運動史》〉，《女學學誌：婦女與性別研究》，18: 197-208。doi: 10.6255/JWGS.2004.18.197
- 王雅各（1999），《臺灣婦女解放運動史》。臺北：巨流。
- 台大女研（無日期），〈關於台大女研〉，《Facebook》。取自 [https://www.facebook.com/ntufeminismclub/about\\_details](https://www.facebook.com/ntufeminismclub/about_details)
- 台大女研社（1988），〈女大學生的自覺、批判與實踐〉，《新女聲》，1: 1。
- 台大女研社（1990a），〈廣場上的野百合：大學女生行動聯盟的誕生〉，《新女聲》，6: 1。
- 台大女研社（1990b），〈小紅帽大事紀〉，《新女聲》，7: 3。
- 台大女研社（1991），〈當女研社碰到制憲聯盟：兩種學運的第一次接觸〉，《新女聲》，8: 1。
- 台大女研社（1993），〈性騷擾特寫專題〉，《新女聲》，11。
- 台大女研社（1995），〈選舉紀念專刊〉，《新女聲》，13: 1。
- 民生報（1995 年 5 月 10 日），〈A 片事件的弔詭情境〉（社評），《民生報》，第 2 版。
- 伍維婷（2019），〈大學女研社與婦女運動之一九八八至二〇〇〇年〉，簡扶育編《女人展痕 3：百年女史在臺灣：臺灣女性文化地標》，188-199。  
臺北：新自然主義。
- 何榮幸（2014），《學運世代：從野百合到太陽花》（全新增訂版）。臺北：時

報文化。

李元貞（2014），《眾女成城：台灣婦運回憶錄》（上）。臺北：女書文化。

李玲茹（1995年5月9日），〈女生們，請為同胞「保留」點〉，《聯合報》，第11版。

李維菁、張鐵志（2017年1月2日），〈李維菁VS張鐵志四之一：90年代〉，《聯合報》，第D4版。

念淮（1995年5月9日），〈女生們，不妨一起去看A片〉，《聯合報》，第11版。

林人芳、程紹淳（1995年5月7日），〈台大女舍A片登堂入室〉，《自立晚報》，第4版。

林仁傑（2004），《一段跨時代的故事：台灣學生運動史研究（1920-1994）》，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

洪三雄（1993），《烽火杜鵑城：七〇年代臺大學生運動》。臺北：自立晚報。

范晴嵐（1999），〈台大女研啟示錄〉，《婦女與兩性研究通訊》，51: 1-3。

范雲（2003），〈政治轉型過程中的婦女運動：以運動者及其生命傳記背景為核心的分析取向〉，《台灣社會學》，5: 133-193。doi: 10.6676/TS.2003.5.133

范雲（2004），〈評介王雅各：《臺灣婦女解放運動史》〉，《女學學誌：婦女與性別研究》，18: 209-214。doi: 10.6255/JWGS.2004.18.209

孫瑞穗（2016），《指尖上的敲打樂：性／別文化評論集》。臺北：唐山。

高穎超（2006），〈誰伴著「青衿同志」小學畢業？——校園同志運動的處境、策略及盟友〉，《性別平等教育季刊》，34: 85-92。

婦女新知雜誌社（1987），〈關心婦運的新生代〉，《婦女新知》，67: 1-4。

張娟芬（1998），《姊妹「戲」牆：女同志運動學》。臺北：聯合文學。

張娟芬（編）（1991），《誤解小辭典以及正解小辭典》。臺北：台大女研社。

- 張景森、張聖琳（1988），《婦女與都市環境：國外文獻回顧與台北市的經驗研究》。臺北：祐生文教基金會。
- 張華蓀（2005），〈蝸行 20 年：女性主義地理學在臺灣的發展〉，《地理學報》，42: 25-46。
- 張聖琳（1989），《空間分工與勞工運動：新埔地區的個案研究》，國立臺灣大學土木工程研究所碩士論文。
- 畢恆達（2004），〈女性性別意識形成歷程〉，《通識教育季刊》，11(1/2): 117-146。doi: 10.6745/JGE.200406\_11(1\_2).0004
- 畢恆達（編）（2000），《白絲帶運動：男人參與終止性（別）暴力》。臺北：臺灣大學人口與性別研究中心婦女研究室。
- 畢恆達等（1999），《台大校園性別空間總體檢》。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性別歧視與性侵犯防治委員會。
- 陳正維（2012 年 11 月 12 日），〈這些年，我在婦運走闖的日子〉，《網氏／罔市女性電子報》。取自 <https://bongchhi.frontier.org.tw/archives/19347>
- 陳怡靜（2009 年 12 月 31 日），〈同層不同房！台大生露營 爭男女混宿〉，《自由時報》。取自 <https://news.ltn.com.tw/news/life/paper/362601>
- 陳明秀（1990），〈台大女研社：要講女生的話、做女生愛做的事〉，《婦女新知》，101: 19。
- 陳東升（2020），〈專業組織的持續組裝與知識創新：台灣大學社會學系 60 年的變遷〉，《台灣社會學》，39: 167-192。doi: 10.6676/TS.202006\_(39).06
- 陳鈺馥（2021 年 5 月 6 日），〈學生會長也是線民！促轉會揭「校園安定系統」佈建情形〉，《自由時報》。取自 <https://news.ltn.com.tw/news/politics/breakingnews/3523229>
- 搔姐妹口述，陶欣整理（1991），〈一個女人組織的成長：回顧搔角度〉，《婦

女新知》，106: 9-12。

彭濟雯（2006），〈從女廁運動到無性別廁所——一個參與者的反省〉，《性別平等教育季刊》，34: 76-84。

黃麗玲（編）（2017），《國立臺灣大學性別友善廁所設置準則及參考手冊》。

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校園規劃小組、國立臺灣大學學生會性別工作坊。

楊蕙菁（1995年5月11日a），〈台大女舍「A片批判大會」今播出〉，《聯合報》，第5版。

楊蕙菁（1995年5月12日b），〈看A片 百餘人 有些鏡頭快轉〉，《聯合報》，第5版。

廖和敏（1990年1月6日），〈校園中的新女性〉，《聯合報》，第25版。

劉欣蓉（1992），〈大學女生宿舍的性別論述〉，《中國論壇》，32(6): 81-83。

劉慧君（1991），〈女研社是什麼？〉，《新女聲》，8: 4。

鄧丕雲（1993），《八〇年代台灣學生運動史》。臺北：前衛。

鄭育婷（2015），〈Ladies first：女性優先籃球場〉，《性別平等教育季刊》，73: 30-34。

鄭美里（2006），〈想起在掙角度的日子——記1990-1992台北跨校園女性主義讀書會〉，《性別平等教育季刊》，34: 41-46。

鄭美里（2022年9月1日），〈從婦女新知到社區大學，我的讀書會時光〉，《Openbook 閱讀誌》。取自 <https://www.openbook.org.tw/article/p-66756>

鄭鴻生（2001），《青春之歌：追憶1970年代台灣左翼青年的一段如火年華》。臺北：聯經。

聯合晚報（1995年5月9日a），〈台大女生壓力好大，A片影展「重新選片」〉，《聯合晚報》，第7版。

聯合晚報（1995年5月9日b），〈校園A片震撼〉（社論），《聯合晚報》，第2版。



聯合報（1995年5月16日），〈從A片與黑色書刊論當前社會風氣〉（社論），《聯合報》，第2版。

顧燕翎（2020），《台灣婦女運動：爭取性別平等的漫漫長路》。臺北：貓頭鷹。

### ◎作者簡介

畢恆達，國立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教授，主要研究領域為性別與空間、塗鴉與街頭藝術、環境心理學，曾出版《空間就是性別》、《空間就是權力》、《空間就是想像力》等書。近期研究主題為性別友善廁所規劃與設計；從女性主義觀點研究建築教育、專業與實踐；陰莖獨白。

洪文龍，美國 Rutgers 大學婦女與性別研究學系碩士。曾擔任教育廣播電臺《性別平等 Easy Go》節目主持人。主要研究興趣為性別與空間、男性研究。近期研究計畫為陰莖獨白。

陳志軒（通訊作者），國立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博士，現任職於臺灣高等教育產業工會。興趣與專長領域為文化研究、性別與空間研究、環境心理學。近期研究主題為電影與國族主義再現，以哥吉拉電影為對象，剖析二戰記憶如何轉化為影像中怪獸與城市共構的破壞美學。

### 〈聯絡方式〉

E-mail:

畢恆達：hdbih@ntu.edu.tw

洪文龍：menstudy@ms47.hinet.net

陳志軒：peterretep@gmail.com

## **Linking and crossing: Establishment, oper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the Women's Studies Society,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i>Herng-Dar Bih</i>	Graduate Institute of Building and Planning,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i>Wen-Lung Hung</i>	Department of Women's and Gender Studies, Rutgers University
<i>Chih-Hsiuan Chen</i>	Graduate Institute of Building and Planning,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The Women's Studies Society (WSS) of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was the first feminist student club in a university in Taiwan, and it played an important and enlightening role in shaping the female/gender consciousness on campus at Taiwan's foremost university. This study mainly interviewed 16 active members, and further collected the official publications and media news to analyze the developmental process of the Women's Studies Society from a feminist perspective. Although the WSS was aware of "gender as an oppressive category," the starting point of the WSS at its founding in 1988 stood at the intersection of gender and class. However, after the failure of the strike movement, the WSS decided to return to the campus out of concern for the personal issues of college female students, including personal safety, bodily autonomy, dormitory, and romantic or parental relationships. After gender issues became mainstream in the 1990s and women activists moved on to more advanced

issues, the WSS renewed a position that focused on academic exchange. From the historical perspective of social movement development in Taiwan, the emergence of the WSS not only confronted the patriarchal structures embedded on the campus, but also brought in a vision of campus democracy from a gender perspective, along with the process of dialogue among dissident student societ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gender movement, the WSS not only guided the promotion of many gender issues to present, but also cultivated new blood for the next generation of the future women's movement.

**Keywords:** women's studies society, feminism, women's movement, student movement, gender consciousness